

DANGDAI ZHONGGUO GUANGBO DIANSHI HUIYILU

当代中国广播电视 回忆录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

01-6/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广播电视编辑委员会

主 编 阎 玉

副主编 赵水福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白谦诚	杨伟光	杨正泉	何大中
张伟中	张品兴	胡耀亭	赵玉明
郭宝新	贾德安	夏之平	戚庆莲
韩庆余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广播电视编辑部

阎 玉	赵玉明	戚庆莲	周 经
潘继秋	张 昕		

总序

吴冷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已经走过45年的历程,在这40多年里,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中国的广播电视事业也从小到大,迅猛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到1992年底,全国广播电台已从1949年的49座,发展到812座,电视台从1959年的7座,发展到586座;广播节目套数从1949年的49套,发展到983套,电视节目套数从1959年的7套,发展到644套;广播人口覆盖率,1949年时只能覆盖极少数地区,发展到覆盖75.6%,电视人口覆盖率,1959年时,每个电视台只能覆盖周围几十公里,发展到覆盖81.3%;全国收音机的社会拥有量,从1949年的100多万台,发展到2.1亿多台,电视机的社会拥有量,从1958年的一二百台,发展到2.2亿多台;微波站从1949年的零,发展到1119个站,微波线路从1949年的零,发展到4.9万多公里;卫星电视地面站,从1958年的零,发展到3.9万多座。

中国广播电视在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发展中国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它在国内外的影响越来越大。

我国广播电视事业的成就,是在党中央领导下,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怀和支持下取得的;也是广播电视系统几十万职工,特别是广播电视的先驱者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艰苦创业、团结奋斗、辛勤劳动、努力进取的结果。这些老同志绝大部分已经离休或退休,但是,他们的丰富的经验教训,是我们广播电视事业极其宝贵的财富。

为了总结历史经验,并为后来者留下可贵的历史资料,广播电视部电影电视部决定编辑出版《当代中国广播电视回忆录》若干集。在此以前,中央广播事业局曾委托北京广播学院编辑出版过3集《中国人民广播回忆录》,这3本回忆录主要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人民广播事业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和重要历史经验。而《当代中国广播电视回忆录》主要是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40多年的重大事件和重要历史经验。这样,中国的广播电视事业就有了一套从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创建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50多年,由很多老同志撰写的亲身经历过的、比较完整的历史资料,它是我们广播电视系统丰富的宝贵财富。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这些回忆录中,包括了《周恩来与广播电视》专集。中国广播电视的发展过程中,周恩来在各个时期、各个方面都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关怀。从中国第一座人民广播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创建(周恩来担任广播委员会主任)到新中国成立后将近30年的发展变化中,在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重大决策和重大问题,在许多具体工作、具体项目上,都有周恩来的支持和帮助。可以这样说,广播电视能有今天这样的发展规模,有现在达到近40万职工的干部队伍,都是与周恩来分不开的。编辑出版《周恩来与广播电视》专集回忆录,既是对周恩来的纪念与缅怀,又是对广播电视全体职工,特别是年轻职工进行传统教育的教材,也是为党和国家提供了宝贵历史资料。

收入第一集的 70 多篇回忆文章的作者所撰写的都是他们亲身经历过的具体内容。它主要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广播电视发展的历史过程。从这些回忆录中,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时,如何接收国民党旧电台和私营电台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在国民党遗留下的破烂摊子的基础上,老一代广播电视工作者,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艰苦创业,逐步发展我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历史事实。

第二集共收入 58 篇回忆文章,它重点记述“文化大革命”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广播电视事业蓬勃发展的历史事实。

当前,广播电视已进入高度发展的电子技术、航天技术、计算机技术的时代,过去的几十年已成为历史。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历史,特别不应忘记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但历史的经验教训更可贵。它对研究历史,对今后继续发展我国广播电视事业,对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对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广播电视都有参考价值。历史经验教训的可贵,在于供给人们继续前进的力量,在于给人们研究和解决新问题以智慧,而不是束缚我们的手脚,不应固步自封。在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我们要在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正确运用历史经验,从中得出规律性的认识,以使用新的、科学的方法和革命精神,迎接历史赋予我们的新任务。

目 录

总序.....	吴冷西(1)
一场特殊的战斗.....	耿飚(1)
在第一线的最后五年半	张香山(11)
历史性的检阅	
——回忆毛主席两次检阅湖南电视	李晓忠(33)
深情的回忆	
——瞻仰中南海毛泽东主席故居	陈 襄(41)
廖承志同志和对日广播二三事	李顺然(52)
在他们的关怀下成长	
——记一些领导同志关怀北京电视台、	
电视艺术中心的部分事实	张永经(55)
梅益关心民族地区广播	秦石麟(66)
吴冷西印象	施 芹(71)
令人难忘的历程	栗国安(78)
北京电台宣传改革回顾	于云先(86)
回顾与思考	
——河北电台改革历程追忆	韩丙寅(94)
坚持改革 不断前进.....	罗德成(101)
影视工作琐忆.....	谢文清(108)
我接待布什总统的前前后后.....	黄惠群(120)

一次难忘的外事接待·····	张 武(125)
中央台理论宣传的回顾(1975—1981年)·····	阎 玉(132)
关于国际台评论组的一些回忆·····	席升茂(145)
发挥广播评论的“炮弹”作用	

——我写广播评论《中国的主权不容侵犯》的回忆

·····	刘尔煌(151)
《午间半小时》之忆·····	谢文秀(157)
从播音员到主持人·····	雅 坤(164)
江苏台《农村节目》早年改革的回忆·····	韩 泽(170)
为农业生产责任制鼓与呼	

——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安徽台的《对农村广播》

·····	梁 斌(180)
电视首要任务是办好新闻性节目·····	康心源(186)
一次充分显示广播优势的新闻报道·····	王月仁(191)
唐山大地震当天的对日广播·····	日本专家 添田修平(196)
早晨,空气多么清新	

——编发湖北电台早新闻的片断回忆····· 王允渊(199)

一次难忘的采访

——记参加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报道

·····	戚庆莲(203)
在南极的六十个日日夜夜·····	陶葆发(210)
登山采访	

——我的记者之旅····· 张小平(218)

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采访记·····	袁冰西(231)
为了光辉的一瞬	

——记发射“亚星”、“澳星”现场直播的导演工作

·····	杨宪文(240)
报道“双城堡事件”的前前后后·····	贺俊文(246)

消逝的足迹·····	刘习良(253)
难忘的岁月·····	邹大昌(265)
第一次全国听众抽样调查追记·····	左 辛(276)
三个台阶 三大突破·····	胡耀亭(281)
华侨听众工作回忆·····	葛雨笠(289)
广播记者四十年·····	杨兆麟(292)
我与电视·····	洪民生(304)
广播采编生涯四十载·····	邱方若(315)
十七年的痕迹·····	韦尚勋(319)
群策群力 辛勤创业	
——北京电视台创建回顾·····	汪小为 朱 峰(322)
崛起的十年·····	游锦坤(328)
在拼搏中奋进的四川电视台·····	陈 杰(334)
架空中彩桥 传时代旋律	
——河北电视台 25 年回顾 ·····	王根旺(341)
艰苦创业 不断进取	
——广西电视台创业和发展回忆·····	谈忠德(347)
海峡之声广播电台的创建与发展·····	林智勇(354)
无悔的岁月	
——关于我国农村广播网工作的回忆·····	陈海峰(365)
一斤鸡蛋办广播·····	董启煥(376)
献给英雄战友的一束小花·····	张志祥(380)
为了不中断广播	
——记地震期间的天津广播电视工作者·····	董树义(385)
积微与陟遐·····	陆 原(392)
清贫也是一种财富	
——在北京广播学院学习的回忆·····	张振华(397)
立下育人志 百天建中专·····	高九林(402)

艰苦创业在基建工地.....	梁镇湘(405)
回忆泮子山发射台的创建.....	赵永杰(410)
564 台天线抢修纪实	北京大修队(415)
誓为亚运做贡献	
——为中央电视塔安装微波透波墙板.....	北京工程处(417)
编后记.....	(419)

一场特殊的战斗

耿飚

1976年10月，月黑风高、灾难深重的神州大地，骤然烟消雾散，风云突变。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采取果断行动，干净利落地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全国各族人民得知这一消息，无不雀跃欢呼，欣喜若狂，热烈庆祝中央在危急关头的政治较量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结成的“四人帮”，利用“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严重左倾错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残酷迫害革命干部，挑动群众斗群众，指使造反派大搞“打砸抢”，妄图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这伙阴谋家深知“笔杆子”的重要作用，把新闻工具牢牢掌握在手里，为他们篡党窃国制造反革命舆论。因此，中央在解决“四人帮”问题时，作为一项重要的举措，就是马上派人到各中央新闻单位，控制住宣传舆论阵地，使它们重新成为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巩固和扩大已取得的胜利，稳定全国的局势。

当时，我奉命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加强对广播电视宣传的领导。我在广播局只工作了10天时间，但那段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记忆犹新。有不少报刊文章和书籍写到粉碎“四人帮”时，涉及到这个问题，但其中有些描述与事实有出入。常有一些同志问我当时的真实情况，现将我到广播事业局前前后后的一些

事情记述如下。

(一)

“四人帮”在十年动乱中，罪恶滔天，罄竹难书。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他们恶毒攻击和迫害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一伙就和林彪一伙相勾结，指使和操纵外事系统的造反派批斗陈毅外长，揭批所谓“三降一灭”，实际上矛头是对准周总理的。当时，外交部有不少干部和群众都反对他们这样做。黄镇同志和我发起写了一张有26位驻外大使签名的大字报，反对通过“打倒陈毅”来攻击周总理，来否定我国正确的外交路线。我们这一行动遭到江青等人的指责，说什么这是“二月逆流”新反扑，并把我們打成“耿黄集团”。

1974年1月25日，农历正月初三，“四人帮”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行了一个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这个会事先并未经过中央讨论，也未把开会的意图告知周总理，却在开会前临时通知他参加，并要他主持大会。显然，这是“四人帮”借“批林批孔”，对周总理搞突然袭击。

在这个会上，“四人帮”还安排中联部的造反派发言，向我这个部长“开炮”，说什么中联部的“批林批孔”搞得冷冷清清，耿飚对运动有抵触情绪，进行消极抵制等等。

周总理对于此事感到不安，曾几次鼓励和安慰我。记得“1·25”大会第二天，我到总理办公室，气愤地说：“现在不但‘批林批孔’，还提出‘批周公’，矛头所向不是很清楚吗？中联部不是没有‘批林批孔’，而是没有按照他们要求的那一套来批。”我向总理请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没法工作，可不可以辞职不干？”周总理斩钉截铁地说：“不行！”过了一会儿，他又用和缓的语气鼓励我：“人家打你，你不要倒！赶你，你不要走！整你，你不要死！”

后来，1975年7月17日，周总理在医院中会见罗马尼亚客人。这是总理最后一次会见中联部邀请的外宾。外宾走后，周总理对我重提一年多前的旧事：“那次‘1·25’大会，是我主持的，会上有人发言攻击你，真对不起你，我本来可以不让他发言……”我答道：“总理，这件事和您无关，是他们早就安排好的。不过，这样一来，对我倒有些好处。”“啊，还有好处？”周总理觉得意外：“对你有什么好处？”我说：“中联部的客人来了，过去都是他们会见，我陪见，别人从电视上报纸上见到我老是和他们在一起会见外宾，以为我和他们是一伙的。现在好了，‘1·25’大会帮我和他们划清了界线。过去，有些老战友对我有误解，不理睬我，在那次大会后明白了真相，反而同我更亲热了。”周总理听了“哈哈”大笑起来，并说：这倒是坏事变好事，看来他们是批“空”了。

在周总理病重住院期间，“四人帮”一直没有停止对他的攻击和迫害。几位老帅和老同志到医院探望周总理，江青一伙派王洪文背着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到长沙去向毛主席告状，诬陷周总理与老同志搞“秘密串联”。毛主席看穿了江青一伙的阴谋，严厉斥责了他们。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广大人民群众悲痛万分，纷纷自发举行各种悼念活动。但是，“四人帮”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并由此造成了震惊中外的“天安门事件”。当时，我心情十分复杂，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深感忧虑，密切注视着“四人帮”还会有什么新动作。

（二）

同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因病与世长辞。毛主席逝世后，人们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毛主席临终前留下什么话没有？我在瞻仰遗容、守灵和参加悼念活动中，都没有听说有什么遗言，只听说，

从9月初起，毛主席经常处于昏迷、半昏迷状态，即使想留下什么话，恐怕也力不从心了。如果有什么遗言，在毛主席去世后，中央《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以及华国锋同志所致的悼词中一定会提及的，可是，在这些历史性文件中只字未提这件事。

令人纳闷的是，从9月下半月开始，报纸、电台、电视台突然大张旗鼓地宣传起“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来了。报上用黑体铅字印出，做成通栏大标题；有的还把“按既定方针办”作为毛主席语录登在报头上。这个遗嘱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对什么人讲的，不得而知。有的报纸怕老百姓不懂“按既定方针办”是什么意思，解释说，“按既定方针办”就是“要坚持与走资派作斗争”，就是“要坚持学习，深入批邓”，就是“要按文化大革命的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这种宣传的背景和用意当时我还不完全清楚，但从字里行间多少闻出点味道来了，说穿了，就是要按“四人帮”那一伙人过去乱党、乱军、乱政、篡党夺权的“总纲领”办。

我在和肖劲光、王震等同志交谈中，对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感到气愤，对于江青等人的野心感到担心。我们希望叶帅等老同志能出来解决“四人帮”问题，挫败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但是，又觉得此事关系重大，必须由当时身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同志出面，才是名正言顺。那时我们并不知道，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已在酝酿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办法。

国庆节过后，10月2日晚上，华国锋同志突然打电话要我去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厅东厢房会议室商量事情。我到 he 那里时，外交部的韩念龙、刘振华同志已经先到了。华国锋让我们坐下来，开门见山地说：“你们都来了，好，想和你们商量解决一个问题。乔冠华（外长）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稿上，提到了‘毛主席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我昨天见到这个送审稿时，批了几句话。我说发言稿中引用毛主席的话，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3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

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乔冠华9月30日已去联合国，10月4日要发言，现在已是2日晚上，你们看有什么办法，能把他在联大发言稿中的‘按既定方针办’那句话去掉，时间还来不及得及？”我说：“因为时差的关系，纽约比北京晚13个小时，所以离发言还有两天时间。”研究结果，由韩念龙、刘振华去打电话，用外交部决定的名义，通知乔冠华在发言稿中删去这句话。

韩念龙、刘振华走后，我就问华国锋，从字面上看，“照过去方针办”和“按既定方针办”差别并不大，为什么要去掉这句话。

华国锋对我说：“毛主席没有什么‘临终嘱咐’，不应该这么说。4月30日晚上，毛主席会见外宾之后，我向主席汇报了各省的情况和干部安排问题。毛主席怕我听不清，就用铅笔给我写了‘照过去方针办’。这根本不是什么临终时的嘱咐，而是针对我汇报的情况，对我个人说的。现在他们把6个字改了3个，把对我讲的变成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们这样做，就可以把他们干的许多毛主席不同意的事情，都说成是‘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了。他们就有了大政治资本了嘛！”

我听了这番解释，对舆论工具这一段时间内为什么大张旗鼓地宣传“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的背景和用意，就更加明白了。临走时，华国锋对我说：“近日有事要找你，你在家里等着。”

4日，我在家等华国锋的电话，特意找来当天的报纸，看看形势和动向。只见当天《光明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署名“梁效”的长篇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章说：“学习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我们信心满怀、斗志更坚。”“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读着这篇反革命宣言书式的文章，我头发都气得竖起来了。我意识到，一场大决战就要来临，

这篇火药味十足的文章，明明是他们一伙要立刻动手篡位夺权的一颗信号弹。

下午两点，华国锋派车把我接到他的住所去。我们接着2日晚上的话题谈起来。我谈了对《光明日报》文章的看法。我说：“人家在下战表了！”我还说：“据我推测，三五天内他们可能会有行动。”华国锋问：“你有何根据？”我说：“他们在上海搞了个大电台，民兵发了枪，那里是他们的根据地。在北京，我数了数，大概有10来个部门，甚至不止这个数目要跟他们走。还有一种说法，他们计划10月8日在长沙开始搞游行。9日在上海搞游行，宣布王洪文为党的主席，张春桥为总理。10日向国外广播，同时北京搞游行庆祝。北京有‘两校’，还有几个部会带头游行，逼着那些他们尚未控制的部门跟着参加。那时形势就严峻了。”

华国锋问：“你们中联部怎么样？”我说：“中联部不沾边。有人想整我，但中联部的干部绝大多数和我是一致的。”

华国锋听了我的回答笑了。接着他严肃地说：“中央决定有一项任务要交给你去完成。”我听他这么说，出于军人的习惯，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立正回答说：“坚决完成任务！”华国锋拉我坐下，然后说：“具体任务以后会向你交待。最近这几天你就呆在家里，哪儿也不要。要我亲自打电话才算数。”我回答说：“我懂了。”

我离开华国锋住所时，虽然还不了解要交给我什么具体任务，但我已感觉到了这项任务的分量。我意识到，我们党同“四人帮”的决战就要打响了，决定祖国命运的时刻就要来临了。

(三)

从华国锋同志那里回家后，我就呆在家里。6日晚上8点钟，电话铃响了。我听得真切，电话中是华国锋的声音。他要我坐自己的汽车，迅速赶到中南海怀仁堂。

我坐车直奔中南海西门。一进院里感到气氛很紧张，岗哨不少，像是出了事的样子。我进怀仁堂后，见到叶剑英同志与吴忠同志（当时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在谈话，华国锋同志和邱巍高同志（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在说话。这时，我才知道，华国锋经过同叶剑英、李先念同志研究和反复商量，并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同意后，已在这天晚上，由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意志，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审查，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

华国锋和叶剑英向我交待任务，华国锋同志说：“你和邱巍高到广播电台去，要迅速控制住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叶帅作了补充交待。

我对华国锋同志说，需要有你的手令。他说：“好！”当即拿笔在一张白纸上写：“邓岗同志：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飚、邱巍高同志去，请你们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华国锋 10月6日”

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由北京卫戍区警备一师的部队守卫，因此，我请邱巍高把警备一师的副师长王甫找来，要他一同去。

出发前，华国锋对我说：“究竟怎样搞法，如何控制住电台、电视台，来不及细想，一切交给你去办了。总的原则是可以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内部已发生了变化，但外面不要让人看出异常来。”

我们领受完任务后，就乘车去广播事业局。有的文章说，耿飚带了多少兵去占领电台。这是误传。守护电台还是原来那班人员，只是派了一位卫戍区副司令员和一位副师长去加强领导，这可以说是一场特殊的战斗。

我们到广播大楼已经将近晚上10点钟了。我们直接到局长邓岗的办公室。他还没有下班，但像是准备睡一会的样子，因为他来开门时衣服扣子没有扣好。他看这么晚了，来了这些不速之客，显

得有些紧张。为了说明来意，我把华国锋的手令拿给他看。邓岗看完手令，半天不说话。我见他在思索犹豫，就对他说：“你如果要给姚文元打电话请示，可以打。”邓岗明白了我话中的含义，连忙说：“没必要了。”我接着说：“那好，请你把领导班子的人统统找到你办公室来，就说有事要商量。”在邓岗打电话召集人的同时，邱巍高他们已经掌握了电台直播室，在直播室和机房门前加强了岗哨。20分钟后，我给华国锋打电话报告：“已经控制住了，领导人都在这里，你放心。”话机里传来了华国锋喜悦的声音：“好！干得漂亮！”

被邓岗召集来的广播局核心小组成员有11位，在这个会议上，我把华国锋手令的内容念了一遍，并要求大家紧跟党中央，把工作做好。在广播电视宣传上，主要要把握住两条，一是有关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不能泄露，二是不要再宣传“按既定方针办”，所有节目有这句话的都要删掉。23点40分，邓岗召集各部门领导紧急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电台对内对外各编辑部连夜检查节目。

电台的要害部位是控制住了，但工作还要正常运转，光靠邱巍高、王甫我们3个人是不行的。邱巍高说：“要找人，我们只有武的，没有文的，还是从中联部找人吧！”我立即打电话到中联部，把张香山和冯铨两位副部长请来，还找了其他一些同志。他们的任务主要是审查播出前的节目胶带，包括文字节目和歌曲、音乐节目，凡节目中提到“按既定方针办”的，一律删去，并撤换了不妥的节目。

那天晚上，我对邓岗说：“我们得住在这里，你也不要回家了。”于是，就在邓岗两间办公室里架了几只行军床。头三天我们睡觉不脱衣，不脱鞋，连吃饭、喝水都不离开，由战士送去，完全是一种战斗生活，准备随时应付突发情况。特别是第一天晚上，没有那么多床，我跟邱巍高轮流睡一张床，我睡一会儿，再换他睡一会儿。所谓“睡”，不过是躺一躺，放松一下筋骨，眼睛瞪得大大的，脑袋里在翻江倒海，想着还有什么漏洞没有？还有不周全的地方没有？还会出现什么突然发生的情况？应当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四人帮”虽然